

民间学术共同体的结盟

——陈玉璫《学文堂集》序文解读

郭英德

内容提要 清康熙年间，武进人陈玉璫编撰《学文堂集》，为其作序者达40人之多，堪称自来别集中所罕见。这些序文叙写了《学文堂集》结集、赠阅、征序的过程，并以诗文集序独特的交往关系叙事体式与情景对话议论体式，呈现出陈玉璫与序作者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丰富多彩的对话内容。借由这一典型的个案，可以从一个角度透视清前期民间学术共同体的结盟方式及其社会文化功能。

关键词 诗文集序；陈玉璫；交往叙事；议论体式；民间学术共同体

从明代中期开始，随着雕版印刷术广为普及，诗文集刊刻层出不穷，加上文士标榜之习方兴未艾，文坛上为诗文集作序撰跋的风气便广为流行。这种风气至清初达到极盛，一部诗文集动辄有七八篇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其最甚者，如武进（今属江苏常州）人陈玉璫编撰《学文堂集》，向大江南北文士广征序文，序作者竟至少有40人之多。张舜徽最早注意到《学文堂集》的这一奇特现象，并评论道：“惟卷首所登诸家之序……多至二十余人，亦自来别集中所罕见。虽云交游弥广，无非友朋颂扬之辞，然而褒美已甚，不脱文士标榜之习。积牍连篇，转成是集之累矣。”^{〔1〕}这40位序作者身份各异，既有贰臣也有遗民，既有缙绅也有布衣，他们通过序文与陈玉璫相互切磋，形成一种学术交流网络^{〔2〕}。本文拟深入解读《学文堂集》序文，借以考察《学文堂集》结集、赠阅、征序的过程，并通过诗文集序独特的叙事方式与议论方式，梳理序作者与陈玉璫之间错综复杂的交游关系，揭示序文丰富多彩的对话内容，以期从这一典型的个案透视清前期民间学术共同体的结盟方式及其社会文化功能。

一 《学文堂集》的赠阅与征序

陈玉璫字虞明，号椒峰，清顺治十七年（1660）举人，康熙六年（1667）进士，归候铨选。十六年（1677）授内阁中书舍人，次年因北闹事黜革。十八年（1669）试博学鸿词，罢归，居家著述以终。编纂《常州府志》，著《学文堂集》。

现存清康熙间刻本《学文堂集》二十四卷，目录题《学文堂全集》，包括《学文堂文集》十六卷、《学文堂诗集》五卷、《学文堂诗余》三卷，共收录诸家序文32篇^{〔3〕}。其中全书卷首有《学文堂全集序》5篇，作者为冯溥、吴伟业、王崇简、周亮工、卢紘。《学文堂文集》卷首有《学文堂文集序》19篇，作者为黄与坚、奚禄治、盛符升、陆堦、魏际瑞、姜宸英、周启嵩、程世英、钱肃润、汪懋麟、魏禧、戚藩、越閿（即江閿）、何昞、李颙、吴颖、陈瑚、杜濬、张侗。《学文堂诗集》卷首有《学文堂诗集序》5篇，作者为杜濬、谢良琦、黄永、巢震林、陈维崧。《学文堂诗余》卷首有《学文堂诗余序》3篇，作者为沈泌、任绳隗、徐喈凤。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间刻本《学文堂集》不分卷，卷首另有李长祥《学文堂文集序》一篇，为

二十四卷本所未收^[4]。

此外,据查阅所得,撰写于康熙年间而未刻入《学文堂集》的序文,现存于世者至少还有8篇,即:钱澄之《田间文集》卷一三《陈椒峰文集序》^[5],陈僖《燕山草堂集》卷二《学文堂集序》^[6],李邕嗣《杲堂文钞》卷二《学文堂集序》^[7],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二《学文堂集序》^[8],储方庆《储遁庵文集》卷二《学文堂集序》^[9],毛际可《会侯先生文钞一集》卷七《学文堂集序》^[10],邵长蘅《青门簏稿》卷七《陈椒峰文集序》^[11],张贞《杞田集》卷一《学文堂集序》^[12]。

以上40位序作者的41篇序文,作期最早的是谢良琦和陈维崧的《学文堂诗集序》,约撰写于清顺治十四年或十五年(1657—1658);作期最晚的是张贞的《学文堂文集序》,撰写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前后跨度至少为42年。综合查考以上诸序,陈玉璫在数十年间,采取以下四种方式,广泛地向友人赠阅《学文堂集》并征序。

第一,邀读书稿并征序。如康熙十年(1671)十一月冬至日,魏禧记载,他与长兄魏际瑞寓居陈府客园,与陈玉璫等朝夕论文,甚相投契,陈玉璫因嘱二人“论定其文而序之”。又如沈泌说:“余客岁浪迹三吴,往来晋陵九峰间,椒峰为之适馆授餐,论诗谭艺,无闲晨夕,因得尽读其诗歌古文。一日出其诗馀百余篇,属余为序。余虽不敏,不敢辞。”张贞也说:“己卯(即康熙三十八年,1699)秋日,余访君于家。既接欢然,恨相知晚,旋出《全集》,请序卷首。”

第二,拜呈书籍并征序。如康熙十二年(1673)《学文堂集》刻竣,陈玉璫先后往宜兴拜访周启嵩,往太仓拜访黄与坚,往钱塘拜访陆圻,分别赠阅书籍,征求序文。又如毛际可记载:“陈子椒峰所著《学文堂集》,风行海内有年矣。庚午(即康熙二十九年,1690)冬,余偶过毗陵,访陈子于罍圃,出其新订《全集》,篇帙之富,倍于曩时。归途迫岁暮,不能为信宿留,遂先读其经、史、论、辨,而弁言其端。”

第三,邮寄书籍并征序。如康熙七年(1668),邮寄《学文堂集》到宛平(今属北京)呈王崇简求

序;九年(1670),邮寄《学文堂集》到南京呈周亮工求序;十二年(1673),先后邮寄《学文堂集》到北京呈冯溥、王曰高,到扬州呈越闾,到湖州呈吴颖,均远程赠书并征序。

第四,托人转致书籍并征序。如康熙七、八年间(1668—1669),托嘉兴钱梅仙邮寄《学文堂集》,赠送陈瑚并征序。九年(1670)初春,托昆山徐乾学“传致”《学文堂集》若干卷,呈吴伟业并征序。十二年(1673)四月,托丹阳贺宿寄送汪懋麟《学文堂集》,汪懋麟“发其书,属余论次为序”。同年孟夏,托常州通判林鼎复“邮致《诗文全集》”呈卢紘,“兼属以叙言”。康熙十四年(1675)前,陈玉璫编订《学文堂集》二集,托鄞县董道权赠送李邕嗣并征序。

正是通过广泛的赠阅诗文集并征求序文,陈玉璫在文学圈、学术圈精心编织了一张四通八达的“关系网”,建立起一个蕴含丰富的“人脉”资源。《学文堂集》序文的叙事体式,生动地呈现出这张“关系网”的结构方式;而《学文堂集》序文的议论体式,则深刻地揭示出这个“人脉”资源的精神内涵。以下分别论述之。

二 陈玉璫的“关系网” 与序文的交往叙事

在现实社会中,人际交往可以具体区分为四种主要关系,即亲缘、地缘、学缘和业缘。当然,在人际交往中,这四种关系往往不是线状单一结构,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以一种关系为主、同时兼具两种或两种以上关系的网状复合结构,从而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亲缘包括血缘、宗缘、姻缘和族缘(指同一种族),虽有亲疏之别,但都是人与人之间无法割断的最密切的联系。地缘有远近之别,可以是同村、同城、同县、同府,也可以是同一个地域,甚至是同一个国家。学缘有进阶之别,在科举社会中,既包括同学,还包括同年(如举人、进士之类),以及各种师生关系。业缘有等级之别,如官与民(官中尚有同僚、属吏、幕客之类);有行业之别,如士、农、工、商、医、卜等(所谓“九流”“一百二十行”之

类);也有伎艺之别,如诗词文赋、琴棋书画等。

陈玉璫与《学文堂集》序作者之间,就呈现出亲缘、地缘、学缘、业缘这四种人际关系。亲缘,如同样姓陈,陈瑚称他为“吾家椒峰”,陈维崧称他为“家弟椒峰”;巢震林称与陈玉璫是“亲串”,即血亲与姻亲的通称,亦即亲眷、亲戚;黄永与陈玉璫是儿女亲家。地缘,如同属常州府的,有武进巢震林、张侗、黄永、邵长蘅,宜兴陈维崧、周启嵩、任绳隗、徐喈凤、储方庆,无锡钱肃润,江阴戚藩等;临近州府的,有扬州府汪懋麟,苏州府吴伟业、黄与坚、盛符升,镇江府程世英、何絮;同为江南的,有钱塘陆埭、慈溪姜宸英、鄞县李邨嗣、遂安毛际可等。学缘,如盛符升是陈玉璫举人同年,冯溥是陈玉璫康熙六年(1667)会试考官,汪懋麟、储方庆是进士同年,储方庆、毛际可、陈禧、张贞等同举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词科。业缘则主要是因诗文和学术图书的写作、编撰、阅读而投契结缘,包括吴伟业、吴颖、周亮工、卢紘、李长祥、魏际瑞、魏禧、姜宸英、江闳、何絮、李颀、杜濬、谢良琦、沈泌、屈大均、钱澄之等。

从写作者的角度划分,诗文集序可分为自序与他序两大类型。就叙事体式而言,自序类似于自传,是诗文集作者对自身的家世、生平、性格、交游、活动、写作意图等的叙述;他序类似于他传,是序作者对诗文集作者的家世、生平、性格、交游、活动、写作意图等的叙述。《学文堂集》诸序都是他序。他序型诗文集序所营造的文本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在他序型诗文集序中,人际交往关系固然有时仅仅作为一种叙事元素出现,但更常见的是作为一种“潜结构”制约着或引导着文章的谋篇布局,从而显示出隽永的叙事趣味。序作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感受,讲述与诗文集作者之间的交往关系,这往往构成他序型诗文集序的主要叙事线索。于是在他序型诗文集序的书写中,人际交往关系成为一种“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由序作者的刻意“运作”,转化成文本中起承转合的结构方式,为诗文集序的叙事体式注入深厚的社会文化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序型诗文集序实际上是一种“交往叙事”。由他序型诗文集

序衍生出的赠序、送序、寿序等,更是将这种“交往叙事”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在《学文堂集》诸序中,以亲缘、地缘、学缘、业缘等人际关系为焦点而展开的交往叙事,鲜明地呈现出序作者如何运用精巧的叙事体式,将陈玉璫的“关系网”精心地编织到文本的肌理之中,借以描绘文士独特的生存方式,传达细微曲折的人际情感。

以亲缘和地缘为焦点而展开的交往叙事,可以巢震林《学文堂诗集序》为例。巢震林是陈玉璫同里前辈,又与陈家有亲戚关系,所以叙述陈家事迹尤为亲切动人。他写道:

余与椒峰居隔一垣,稔椒峰之为,人,不独诗文足以不朽,且克敦孝道,为不可及。比部公罹难时,椒峰才八九岁,即号呼于当事之庭,卒得脱。母夫人尝患疾,椒峰每夜焚香告天,愿以身代,时时泣不出声。余从隔垣窥之,叹服不置。己亥(即顺治十六年,1659)春,江南有海寇之变,时令弟弢仲病危急,椒峰日同当事登城陴,策战守,夜即至令弟榻左右共寝,手调汤药,达旦不寐。母夫人方避居郊外,椒峰每日必走报曰:“今日弟病差愈矣。”盖唯恐母怀悬悬也。椒峰孝友根于天性,大率如此。《诗三百篇》,皆忠臣孝子所为作,椒峰当之,信无忝哉。

巢震林比陈玉璫年长15岁,又居于其邻里,对陈家的日常生活了如指掌。他刻意选择了陈玉璫与其父亲、母亲、弟弟关系的几个典型事例,赞不绝口地称许玉璫“孝友根于天性”。并且认为,正是这种根于天性的孝友品德,造就了《学文堂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价值取向。

以学缘为焦点而展开的交往叙事,可以汪懋麟的《学文堂文集序》为例。汪懋麟是陈玉璫的进士同年,康熙十二年(1673)撰《学文堂文集序》,叙写道:

康熙八年春,余与石林自吴门抵常州,舣舫舟河上,步访椒峰陈子。陈子出迎欢甚,坐未定,呼童奴持文二大卷置案上,属余读,且亟索酒。时昏黑,门将阖,不及展视,遂携陈子并其文,宿于舟中,且谭且读。……于是欢

饮达曙，各别去。自余来京师，不见三四年，人有从常州来者，即问讯陈子。或言其选《文统》一书，累数十万言，撰述劳苦。又或云方大治屋，辟客园，四方来游者，日饮食满座上。又或云挥千金，购名姝，以自娱乐。传说不类，大抵称陈子名者，日啧啧余前，而余窃疑陈子诡怪好奇，终不知其何所为也。

文中所说的“石林”，即宝应（今属江苏）人乔莱，也是陈玉璫进士同年。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对同年关系的追溯及认同，是士人身份界定、地位诉求、交游需要、仕进助力的一种重要方式。而汪懋麟笔下的同年关系，则超脱身份地位的夸耀和官场仕进的纠葛，呈现为一种臭味相投、志趣相近的文学交流场面。陈玉璫接待同年友人，惟以文酒交欢：“坐未定，呼童奴持文二大卷置案上，属余读，且亟索酒。”汪懋麟也毫不见外，“遂携陈子并其文，宿于舟中，且谭且读”，甚至“欢饮达曙”。同年友人相别后，时时记念于心，而关注的并不是友人的仕途升迁，而是编纂《文统》、招待游客、挥金娱乐等日常生活快事。而所有这些叙事铺垫，都是为了彰显陈玉璫勤奋撰文，以期“为古文传千百世”的不懈努力。

以业缘为焦点而展开的交往叙事，可以吴伟业和卢紱的两篇《学文堂全集序》为例。

吴伟业是陈玉璫友人徐乾学、黄与坚的恩师，又与陈家为世交。他的序文撰写于康熙九年（1670）春，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纵横捭阖，转折有致。序文开篇先叙写陈玉璫赠书属序之事，道：“近徐原一过草堂，传致毗陵陈椒峰《学文堂集》若干卷。反复累昼夜，见其体裁之整，才气之逸，意思之沈雄，字句之典雅，莫不得古人法度而嚆唳其精华，信可并古人以传，非仅睥睨名流已也。”然后笔锋宕开，插叙自己与陈家的“知交三世”，即明末拜谒陈玉璫祖父陈睿谟；清顺治间，与陈玉璫父亲陈咨稷为国子监同僚，“欣奉教言”；此时又获赠《学文堂集》，且“以品题见属，当知己谬爱之深”。接着文章进入正题，仍然采用叙事笔调，叙写陈玉璫中进士后，并不屑于借名以重文，而是“独落落不介意，倍自激励”，“尽发其所藏书，颜其堂曰‘学文’，键户著述不

少休”。由此展开第一层议论，揭示陈玉璫与“一时浮薄之士”迥然有别，“独孜孜矻矻”致力于学，所以“其言皆光辉笃实，始乎绚烂而终于平澹”。行文至此，笔锋一转，先插入倒叙，记述康熙八年（1669）春与陈玉璫的交往：“椒峰向过余梅村，流连旬日，与之谈论诗文，称说古今理乱得失之故，靡不各有原本，沛然如江河，莫之能御。”从而引出第二层议论，即文人才士“只以取科第为急务”，往往不能“终其身为弟子”，最后得出结论：“乡先生而能为弟子之学者，余独于椒峰见之矣。”全文犹如蛟龙入海，起伏变化，姿态横生。

卢紱是吴伟业在明崇祯间典试湖北时所得士，与陈玉璫也有通家之好，所以序署“楚蕲年家弟”。他的序文撰写于康熙十二年（1673），采用时间上由远及近、交往上由疏至亲的叙事方式，娓娓道来，言语朴实而真情流露。康熙元年（1663）卢紱以江南布政司左参政督苏松常镇粮储，历时十二年，一直与陈玉璫因文而神交。他始而会晤毗陵士人龚介眉（即龚百药）、吴星子等，耳闻陈玉璫“砥节砺行，谦谦无异诸生时”的行为，“益有慕乎其为人”；继而通过《文统》《文概》等选本，阅读陈玉璫诸作，“固知其矫黜浮华，卓然为经世有用之文矣”。但是，因为陈玉璫“安恬静处，不肯轻交世人，冠盖周旋，尤非所屑”，所以“虽久留吴中，心私向慕”，却“终不得一见其人”，卢紱反而由此深许“椒峰之品，诚不可及”。最终还是借助于别驾林天友，“邮致《诗文全集》，兼属以叙言”，深深感受到陈玉璫“固以为知文，寻声遥讯”的高识。由耳闻其人，到目睹其文、感佩其品，再到深知其识，如此层层递进的叙写，将陈玉璫“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情衷表达得极为深挚。士人之间因文结缘的“知音”友谊，可以穿透时间和空间，甚至可以不必面晤而息息相通，心心相印。这是一种文化型的生存方式，也是一种情感型的生存方式。

他序型诗文集序原本只是文士群体相互应酬的应用型文章，但是却因序作者与诗文集作者之间交往关系的叙写方式与人际情感的渗透程度，得以区隔出不同的文化层次、价值取向与审美品位。为了加深文本的文化含蕴，提升文本的社会价值，增

强文本的审美趣味,“叙说交往关系”成为他序型诗文集序极为重要的一种结构方式。在交往叙事中,序作者与诗文集作者之间,借由互相熟悉的经历或故事创造出一种情景,使他们各自超越个体的存在,扩展成二人组合甚至是群体组合,既可以是“我”和“你”、“我们”和“你”或“我”和“你们”的组合,还可以是“我们”和“你们”的组合,从而赋予序作者与诗文集作者双方的行动以特定的目的与意义,促使他们更深层次地理解对方,也理解自己,由此形成一种双向互动的亲切认同,激发深厚绵长的友朋情谊。

钱澄之《陈椒峰文集序》就生动地展现出士人之间这种“文酒交欢”的情景:

予以今年暮春过毗陵,访陈子椒峰。椒峰饮我酒,因出其集示予,属为序,而又邀其老友数人,使与予谈。予且饮且读,应对之余,辄览十数篇,惟略得其为文之大指所在。集中为之序者甚多,凡陈子之读书好学深思,与其文之气力法度直追宋唐以上,亦既言之备矣。

吾所谓得其大指,则以陈子能自为陈子之文也。钱澄之阅读《学文堂文集》,在欣赏陈玉璠的文章,“惟略得其为文之大指所在”之际,也饶有趣味地欣赏其他序作者的序文,深深赞许他们备言“陈子之读书好学深思,与其文之气力法度直追宋唐以上”的个性特征与文章价值,同时以一种“竞赛”式的对话姿态,与陈玉璠及其他序作者商谈,表达自身对“陈子能自为陈子之文”的“为文之大指”的独特见解。在这篇序文中,士人之间“以文会友”的深情厚谊,如一江春水汨汨流淌,形塑成精巧的叙事文字。

三 “学文堂”之名实 与序文的对话机制

在中国古代,序体文与生俱来就兼具叙事与议论两种体式^[13]。就议论体式而言,诗文集序与论、说、原、议、解、辨、评、释等议论文体的区别^[14],主要表现为序作者与诗文集作者之间构成一种不言自明的“说”/“听”关系的对话机制。在序文中,这种“说”/“听”关系的构成方式,

可以是诗文集作者不出场的“隐身对话”,也可以是诗文集作者出场的“现身对话”。但无论诗文集作者是否出场,他在诗文集序文中都是始终“在场”的,序作者首先总是在对诗文集作者“诉说”的,而诗文集作者也总是作为“第一听众”或“第一读者”“聆听”序作者的“诉说”,二者之间产生思想的交锋与交流。正如魏禧《叙引》所说的:“书之有叙,以道其所由作,或从而赞叹之,或推其意所未尽。”^[15]只不过在“现身对话”中,这种思想交锋与交流是直接的。而在“隐身对话”中,这种思想交锋与交流则是间接的,但在序文中序作者总是自称“我”“予”“余”“吾”等,并且直呼诗文集作者之名,时或也在序文末尾披露对话语境,如《学文堂集》诸序中“喜而书以寄之”(冯溥)、“喜而为之序”(吴伟业)、“椒峰其必以语我也”(姜宸英)、“所愿吾子其严之耳”(越閿)、“独以告椒峰”(杜濬)之类。

再进一步看,借助于诗文集序构成的对话机制,同一部诗文集的序作者与序作者之间也在互相对话,从而形成一种由“朋友圈”营构的“公共场域”。在这种“公共场域”中,序作者并不着力追求立意的奇特、思想的深刻或论辩的气势,而主要是运用“公共话语”,细致入微地体会诗文集作者的心曲,并别出机杼地陈述可以取得“群体认同”的观点。对序作者来说,诗文集作者的共鸣和“朋友圈”群体的认同,无疑比自身独特个性的彰显更为重要,也更有价值^[16]。因此在诗文集序中,“怎么说”往往是第一位的,而“说什么”则是第二位的。因为“说什么”终究得符合“公共话语”,听众、读者都心知其然,难以出奇制胜;而“怎么说”则可以各显神通,充分体现序作者“言说”的趣味、策略与技巧。

陈玉璠《学文堂记》记载,当康熙六年(1667)他高中进士、归候铨选之时,选择不习为吏,不求举荐,而是专心致志地“聚先人之所遗书”于学文堂中,“朝夕读之,咿唔不异诸生”。他的这种行为方式与一般读书中举的士人相比较,未免显得有些“另类”,这就难免引发世人的质疑:“子行作吏,当习为用世之学,何徒效经生家为?”对此,他的回答是:“此正予之习为用世者也。”^[17]

由诗文集序的议论体式所决定,《学文堂集》的诸多序作者都以“学文”二字的含义以及“学”与“文”之间的关系作为“公共话语”,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揭示陈玉璫为什么以“学文”名堂,并进而讨论“学文”之说何以即“用世之学”,“学文之举”何以即“用世之行”。正如盛符升序文所说的:“独陈子椒峰以学文名堂,兼名其集,若曰:‘我学焉云尔,其止于是,抑进于是,皆未敢必也。’此陈子之深于自命者也。”于是,“学文”必然有助于“用世”,甚至“学文”无非就是“用世”,亦即卢紘序文所说的“其文为有用之文,其学为有用之学”,这就成为诸多序作者认同的“公共话语”,他们分别采用“隐身对话”或“现身对话”的形式,自出机杼地就这一话题展开议论。

我们可以顺治四年(1647)进士周启嵩的《学文堂文集序》为例,考察序作者如何运用诗文集作者不出场的“隐身对话”形式,层层推进地演绎“学而优则仕”的“圣训”,表达与其他序作者相互呼应的“公共话语”。

这篇序文起首就介绍议论话语展开的“语境”：“陈子椒峰青年成进士，候部家居未仕。悯世之人学未优而入政也，肄业学文堂中，大肆力于古文词有年，勒成一编，名曰《学文堂集》。”紧接着直接揭示“学文”以期“远大”的论点，作为全文议论的主旨，并从三个层次展开论述。

第一层，“学文”可以“致用”。周启嵩指出，因为“六经皆文”，“学者神而明之，以化成天下，天下可由斯以大治”。他假借陈玉璫之口论述道：“吾儒读古人书而不能佐治今日之天下，无取乎读书为矣。且居今而论古人，不能举今日之天下拟合于古之天下而大治之，无取乎尚论古人为矣。”与此类同，吴伟业在序文中批评今人之学已非圣人之学，而称许“椒峰独孜孜矻矻，必思有得乎古圣贤之理，力蹙志沉，以求其当，然后一发之于其言，故其言皆光辉笃实，始乎绚烂而终于平澹”。姜宸英的序文着眼于“文章”与“实学”的关系，论述道：“自后百余年，文章家互起，考其要归，大抵鸿臆有余，理趣不足，颇与荆川家法不相类。就其中贯串经纬，时亦有裨实学，而今之杰然者，尤能抒发性灵，驰骋今古而整齐之，为一代之文，此吾

友陈子椒峰所以鹰扬虎视于大江以东，而为海内文士称首，不虚也。”李颀在序文中引用“经天纬地之谓文”的“常言”，并引申道：“子以四教，文为最先。诚以进德修业，非文无从；开来继往，非文不传；黼黻皇猷，非文不著；弘道统，立人杰，非文不振。则文之为文，顾不重哉！”

第二层，“学文”原本就是为“用世”储备知识。周启嵩贯通古今地畅论陈玉璫之“学”与“文”，认为陈玉璫不仅浸淫“古学”，“观其概而考其详，抉其微而殚其蕴，于古既有得矣”，而且致力“今学”，“复取今日天下之人心风俗、纪纲礼乐，与夫一切经权常变、教世化俗之为，斟量优裕，形之篇什，见之诗歌”。《学文堂集》序作者一致赞同士子必须储备有用的知识，不过有的侧重评价陈玉璫之“学”，如冯溥说：“其学自六经、诸史、百家、历律、讖纬、当世之时务，以迄稗官小说，无不究其本末”，“如是，虽古今天下之事，当无有难之者。于以服官，则无适而非其学之所及，至于以是传之后世，固不徒为文章之士而已”。有的侧重评价陈玉璫之“文”，如王崇简说：“且大旨所寄，据经陈典，或婉约其词，俾人省悟，皆有关世道人心，非泛泛以文为适者。”屈大均则综论“学”与“文”，说：“陈子为文甚众，义本儒先，能于五经四子书多所发明，而《易解》诸序尤为精醇，其殆有得于圣人之文耶？”“则学文者，又非徒学夫圣人之文，乃学天之文也。”

第三层，学者之所以“学文”，旨在会通“理道”“政事”“文章”。周启嵩肯定地说道：“椒峰会通乎理道，复磅礴于辞章，其于当代之大经大法，讲之有素，而又有圣君贤相遇知于上，出而为世大用，安在今日诗文一编，非异日大行之左券邪？”这也是《学文堂集》诸序作者的共识。如汪懋麟认为：“凡古人为文者，必先养其气，穷于理，而达于事。养其气，然后为文有纾徐条畅之态，而无躁慢浮动之习；穷于理，庶几得乎圣贤中正之旨，不为邪说曲学之所惑；达于事，则可参于古，酌于今，不徒为空疏可喜之论。今陈子已尽得之，其传于后世何疑也。”杜濬也说：“文章之道，传世不如持世，盖有不必要持世而传者矣，未有持世而不传者也。”“盖今世作者林立，而力为持世之文者，独吾

友陈椒峰。览《学文堂》诸篇，原本六经以端趋向，表章节义以厚风俗。……持世而传世，道固在于是。”

从上述例证不难看出，这些序作者都是从他们所隶属的士人群体的角度，来评判陈玉璠中进士后不懈地“学文”这一行为的，而他们的议论根基于儒家传统的道德责任感，即“学而优则仕”与“仕而优则学”的双向选择。因此，当陈玉璠及其友人营构出一个社群网络，并且在这一网络中互动时，他们必然运用“公共话语”去强化相互认可的普遍观点，进而拥有、相信、凸显乃至张扬儒家传统的道德责任感。于是，“公共话语”的多层面、多元化的运用，便成为这种他序型诗文集序众口一词、同声相应的议论体式。这正是中国古代诗文集序表达思想的基本方式，它通常并不希求提供众声喧哗的解读空间，而是着意提供坐而论道的交谈场所。

与大多数序作者采用“隐身对话”形式不同，陈玉璠的同年进士储方庆撰《学文堂集序》，特意运用诗文集作者出场的“现身对话”形式。储欣在此文后评道：“追述平生及一时问答，前分后总，亦脱尽序文蹊径矣。”储方庆的序文在简要介绍对话“语境”后，让陈玉璠亲自出场：“癸丑（即康熙十二年，1673）秋八月，予将谒选于天官，道出毗陵。椒峰辱顾予，因挟其《学文堂文集》以进”，恳切征序。以下便展开两层虚拟式的对话。

首先，陈玉璠怪罪储方庆，屡次请序，“子卒未有以应。岂以吾为不足与言者耶？抑当世王公大人，下至好古力行之儒，苟有过吾门者，莫不赐之教益，而顾靳于子耶？”储方庆不得不为自己迟迟未能作序的行为开脱，引出长篇议论：

忆吾与子成进士之日，大江以南以文章名当世，无出吾两人右者。天子不遴选侍从、加意文学则已，天子加意文学、遴选侍从，吾两人惧不免焉。既而相率出为外吏，予悒悒不自得也。间从椒峰游，椒峰辄自奋曰：“丈夫亦视自命何如耳。吾两人惟所学之浅，无以结君相知，故相率为外吏。今诚得因未及莅政时，益加意于学，以厉其所守。一旦天子登明堂，望云物，访古封禅之仪，考定律吕，成一代礼乐，诏天下有能明于五帝三王之道，通古今之

宜，可备朝夕顾问者，大吏以闻，而吾两人以此时衰然蔚为举首，不犹愈于嘿嘿致功名者乎？”予闻斯言而壮之。今不过数年，子之学业成就灿然可观，不废本末，至于如是之美且大，以视曩所期许，直须时耳。而吾因不能自广，戚戚终日，无所用其心思，行且与草木同腐，尚安得有所称说，自比于作者之林乎？

这段议论文字，在“当下对话”的语境中，又嵌入一段“往昔对话”，构思相当精巧，议论也相当酣畅。其次，陈玉璠又说：“子此行也必为吏。子以吏行，而吾责之以文，毋乃不相入乎？”储方庆闻言，不禁深深慨叹，辩解道：

噫嘻，斯言过矣。吾岂耽于吏者哉？自吾受职而心已愧之，当世莫不闻也。私念父母见背，未尝一日尽人子职。老祖今年九十有二，家贫不能具甘旨，故兄弟相率干君之禄以养其亲。吾诚有所不得已于中，靦颜忍耻，就污辱之行而不辞耳。何至放弃诗书，屏绝神智，甘为人役之不恤，至如子所云耶？

最后总结全文道：“既行而后书此二者，以告椒峰曰：是亦可以序子之文矣。由前之说，可以知子之用力于文者有自来；由后之说，可以知予之不足于文者非为吏故也。彼夫天下之所以知椒峰者，非吾之所以知椒峰者也。”

储方庆的序文在第一层对话中嵌入的“椒峰辄自奋曰”一段对话内容，明确强调“学以待仕”“学以致用”，这与前述周启嵩等人的“公共话语”如出一辙。但在储方庆设置的“当下对话”语境中，这段“往昔对话”却被他“吾因不能自广，戚戚终日，无所用其心思，行且与草木同腐”的行为所自我“解构”。受诗文集序议论体式的制约，序作者即使希望表达与众不同的见解，也应该仍然采用“公共话语”，以便获得“朋友圈”群体的认同。而储方庆的序文却通篇洋溢着“悒悒不自得”的消极情绪。他一方面对“天子加意文学、遴选侍从”，而陈、储二人却皆成遗珠，“相率出为外吏”，深深地感到遗憾；另一方面又将“干君之禄以养其亲”的行为，说成是“诚有所不得已于中，靦颜忍耻，就污辱之行而不辞耳”的被动选择。在“康熙盛世”，这种“悒悒不自得”消极情绪更多

地是一种“个体情感”，而不符合“当世王公大人，下至好古力行之儒”的“群体心态”，因此难以获得陈玉璠“朋友圈”群体的认同。例如程世英序文说：“今天下文治蒸蒸，一时公卿大夫以及韦布之士，踊跃奋兴于古文，思以阐发经史，扬扈忠孝，翕然而起，如钟鼓之相应，可称极盛。”这才是陈玉璠“朋友圈”群体对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共识，而储方庆的心态可谓“离经叛道”。

也许正因如此，储方庆的《学文堂集序》虽然撰写于康熙十二年（1673）《学文堂集》刊刻之时，却未能像其他序作者的序文一样被陈玉璠选刻入《学文堂集》卷首而流传于世。直到康熙四十年（1701），其子储右文搜集遗篇，方得将此文刻入《储遁庵文集》。这一现象足以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学文堂集》卷首选录刊刻数十篇序文，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公共话语”的交流平台，并以此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基石。

四 民间学术共同体的结盟及其功能

阅读《学文堂集》诸序，可以看到，在陈玉璠“关系网”的形成过程中，“学”和“文”始终是推进士人密切交往的有效“触媒”。正因为如此，序作者格外关注陈玉璠与“学”“文”紧密关联的人际脉络，不烦词费地就此展开议论，从纵横两方面论证陈玉璠的“学文”取向其来有自。这也契合陈玉璠《四书汇解序》所说的：“善为学者，求之于其源而已。”^[18]

有的序作者从亲缘着眼，称颂陈玉璠深厚的家学渊源。如巢震林说：“其大父大中丞鹿莘先生，暨尊人比部邵公，皆以古学名。椒峰渊源家教，穷探典籍。”钱肃润指出陈玉璠乃南宋名人陈亮的十七世孙，“家学之传，有自来矣”，他说：“今椒峰之文，引经据典，动见本原，不戾于法，不诡于俗，其为绍同甫公之传，上溯孟氏，下迄王通，合之以为学文之要明矣。”

有的序作者从地缘着眼，夸赞陈玉璠家乡武进的文章传统。李长祥感叹道：“闻之占玩家，文星聚扬州之野，毗陵当之。信然哉！余感文之难言，而文人之难得也，怀文人久矣，至毗陵则有陈

椒峰。”^[19]明代武进最有名的古文家是唐顺之，所以序作者一致认为陈玉璠是唐顺之的杰出传人。如王崇简说：“毗陵之间，继荆川先生者，其椒峰先生乎？”陈瑚说陈玉璠“生于荆川先生之里，而其文与之后先相颉颃，是即今日之荆川也”。周亮工更为夸张地说：“椒峰莫不根据六经，而出入《左》《国》《史》《汉》，一篇如是，千百篇如是，岂不可驾荆川而上之？”

有的序作者从学缘着眼，追溯陈玉璠古文之学的坚实根基。如戚藩说：“盖椒峰之文，尽芟汉后言，而一之于二史。其酌乎六经者，以二史错变之；其邻乎诸子者，以二史淹达之。所以大家之能事悉奔骤于腕指之下，而莫能名其谁家也。”魏禧说：“椒峰由唐、宋溯秦、汉以上，故其文有源本，格调所成，恢恢乎入古人之室。”陈僖系统地梳理了自六经以降至学文堂的文章传承，说：“文章自六经而后，浸淫于六朝。唐有韩愈，起而振八代之衰。宋有欧、苏、曾、王，倡明其教，而后文章之正道以传。明有晋江、昆山、毗陵、归安诸君子，守其业而未能光大之。则振六经之绝学，为八家之流亚，当专属之学文堂。”

有的序作者从业缘着眼，描述陈玉璠与诗朋文友之间的以古文词为主的研习互动。巢震林说：“吾毗陵诸君子，骚坛互建，久噪鸡林。”黄永说：“犹忆庚寅（即顺治七年，1650）、辛卯（即顺治八年，1651）间，余与文友（董以宁）、訇士（邹祗谟）、公阮（毛羽宸）、卓人（毛重倬）、介眉（龚百药）、椒峰诸子，肇举社事，以古学相勉，旁及诗歌。”李邕嗣说：“椒峰向与同学琅霞（龚百药）、程村（邹祗谟）、文友三君子，相励志为古文词，世称‘毗陵四家’。”

陈玉璠编纂的《学文堂集》，以“学”与“文”为旗帜，以学文堂为纽带，以数十篇序文为文本，将“过去”与“现在”的亲缘、地缘、学缘、业缘等人际关系融会贯通，由此形成一个“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学术共同体。与实体性的文人结社以群体的社会活动为表征不同，这个学术共同体借助于《学文堂集》及其序文的古文书写、文学观念而构成，带有虚拟性、想象性的鲜明特征，是由古文书写和文学观念虚拟性、想象性地建构而成的。

这个学术共同体的“主盟”是陈玉璫，何黎在序文中既欣羨又感慨地写道：

椒峰曩共琅霞、程邨、文友合梓《毗陵四家文集》。……往时余过毗陵，见四子，各出所为文相雠校，其足传不减有宋诸家，且又生同邑，叹为极盛。未数载，程邨、文友竟忽焉以歿，令人念之欷歔流涕。而琅霞先以邑人之灾，郁郁穷愁，近益求适意性命诸书。独椒峰意境勃发，斯文未丧，专赖振兴之力。……欧阳子于亡友梅圣俞、石曼卿、苏子美，切切惟虑湮没无闻于后世，极为表章，数百载下，称说数子，尤称说欧阳子不衰。盖文章朋友，存没之际，相需之重，有如此也。然使欧阳子之文不卓然称于千古，则虽朋友之情，流连笃挚，而卒无益于传不传之数。

何黎敏锐地看到，《学文堂集》中对龚百药、邹祗谟、董以宁等学友的表彰，以及《学文堂集》诸序对陈玉璫的称赞，无不彰显出这一学术团体的“朋友之情，流连笃挚”，更彰显出“文章朋友，存歿之际，相需之重，有如此也”。以陈玉璫为主盟的这一学术共同体，借由《学文堂集》及其诸序的广泛流传，必然得以“卓然称于千古”，而不至于“湮没无闻于后世”。而何黎在此明确地标举北宋欧阳修与梅尧臣、石延年、苏舜钦等组成的文人群体作为典范，则隐寓以陈玉璫为主盟的学术共同体的历史传承与现实效应。

而且，由于《学文堂集》及其诸序的流播，陈玉璫的声誉必将日益高涨，以之为主盟的学术共同体自然愈益壮大。“投桃报李”，《学文堂集》作序者40人中，至少有27人，陈玉璫也为他们撰写了诗文集序、赠序、记事、祭文等文章，作为酬谢^[20]。所以越閤劝诫陈玉璫应严选文字之交，说：“陈子名且日盛，天下之人将以得挂名文字中为重轻，所愿吾子其严之耳。”但是陈玉璫并没有听取越閤的劝诫，在康熙间初刻本《学文堂文集》十六卷中，“序”类文章已占六卷，而且预置的序列至“序二十二”^[21]。其后二十多年，“序”类文章仍然不断增益，不仅将初刻本原阙的“序”类文章序列补齐，而且在初刻本“序”类其他序列中也增加了大量篇章^[22]，其中半数以上是为友人诗文集撰

写的序文。“天下之人将以得挂名文字中为重轻”，成为《学文堂集》传播的突出现象。

再进一步看，同以皇家宗室或达官贵族为主盟的官方学术共同体迥然有别^[23]，以陈玉璫为主盟的学术共同体显然是一个“非官方”的学术共同体，亦即民间学术共同体。中国古代常以“官—民”相对称，其中的“民”涵括“士”（“四民”之一），指尚未步入或已经离开职官系统的士人（包括乡绅）。尚未进入或已经离开职官系统的士人生活在民间，因此具有“民间身份”。虽然陈玉璫在顺治十七年（1660）中举、康熙六年（1667）中进士，康熙十五年（1676）左右入职内阁中书舍人，康熙十七年（1678）获荐应试博学鸿词科，但是在他60多年的生命历程中，绝大多数时间均未进入职官系统，而是主要活动在武进家乡一带，过着一种类似于“市隐”的生活^[24]。前文所述他在康熙年间与江南布政司左参政卢紘的交往就是鲜明的例证。乡居的陈玉璫，恰如吴伟业所说的，是一位“乡先生而能为弟子之学者”，具有既相当自觉、也相当鲜明的民间身份，而他也正是以这种民间身份主盟学术共同体的。

为了维护和发展这一民间学术共同体，陈玉璫可谓煞费苦心，不辞辛劳。从康熙六年（1667）归乡候铨之日起，他就偕同同里友人邹祗谟、董以宁、龚百药等，以早期编选的本朝古文总集《文起》为基础^[25]，广搜博取，搜取一时公卿大夫、韦布之士所为古文，组织同邑友人编纂《文统》一书。康熙八年（1669）、九年（1670），董以宁、邹祗谟相继去世，《文统》的编纂工作由陈、龚二人继续进行。随之龚百药的志趣转向释道之学，而陈玉璫却仍然孜孜矻矻，独撑局面。程世英《学文堂文集序》写道：“吾闻《文统》之选，远近邮寄者文以万亿计。椒峰心目经营，遴而得之者盖数千。”

当然，为了提升民间学术活动的文化品位，陈玉璫等人自觉地选择与“官方意识”互相应和。陈玉璫《文统序》指出，他主持编纂《文统》，既有严格的遴选标准，即“求弗畔乎昔圣贤之道而后登之”，又有明确的文化意图：“我朝抚有区宇，至今皇帝缙承前烈而光大之，所云大一统，非其时乎？”

予欲以国家所统之人文，犁然毕备，以为本朝之文教在是也。”^[26]由此可见，以自觉的“民间身份”应和“官方意识”，编纂《文统》，“网罗天下著作，以成一代大文”，“思以藏之名山，垂之万世”^[27]，这是陈玉璠及其友人的共识。所以何絜称道陈玉璠：“斯文未丧，专赖振兴之力。”而陈玉璠对自己的选文眼光——同时也是交友眼光——也是相当自负的，康熙十七年（1678）春，他撰《益都冯相国夫子寿册序》说：“璠向有《文统》一选，搜集海内之文殆遍，今日应诏者半出其中。”^[28]《文统》的入选者居然半数博学鸿词科的被荐者，陈玉璠的“民间”眼光与朝廷的“官方”眼光竟然如此地“视域融合”，其中隐含的“文化意味”令人深思。

而且，《文统》的编纂起初虽然发端于民间，但的确得到来自官方的鼎力支持，李长祥说：“今得当事之助，则泰山可高，沧海可大，旦夕之间，大贝天球，光烛天地。”^[29]但是，作为《文统》的官方“后台”，大学士魏裔介在康熙九年（1670）遭弹劾，次年上疏告病还乡，从此以后，《文统》的编纂就失去了官方支持的背景，而成为单纯的民间学术文化行为^[30]。也正因为如此，尽管陈玉璠坚持二十多年一直不离不弃，但是作为一种非官方的民间学术文化行为，规模宏大的《文统》编纂实在难以为继，直到康熙三十三年（1694）尚未告竣^[31]。

于是，至少从康熙十年（1671）开始，陈玉璠就另辟蹊径，转而借助于编纂《学文堂集》并广为征序，以期借助于古文书写及其观念的推扬，有效地维持以他为主盟的民间学术共同体的运作。他的举人同年盛符升与他交往甚久，所以深知他的情衷，在序文中说：陈玉璠在“取当世贤人君子之文聚之一室”“《文统》一书哀然成集”的同时，将所撰之文编撰、刊刻、赠阅、求序，即此便得以“知陈子之文足与当世之贤人君子相为后先，以成不朽”。程世英的序文也说，陈玉璠在编纂《文统》的同时，“别梓其自所为古文为一集，曰《学文堂文集》”，“则无论所见万亿之文，与夫周秦、《史》、《汉》、唐宋数千百年之文，无不可约其成于一人之文。呜呼，此则椒峰之所自为文也已”。

对陈玉璠和他的“关系网”友人来说，《学文

堂集》在象征意义上足以涵容《文统》的“万亿之文”，甚至可以作为一种“文化镜像”，将“周秦、《史》《汉》、唐宋数千百年之文”囊括其中，“约其成于一人之文”。由此一来，在文化的意义上，《学文堂集》与《文统》便足以成为“本朝一代文章”“本朝之文教”的“互文本”，而《学文堂集》及其序文的广泛流播，也足以牢固地维系民间学术共同体的结盟，以接续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衍生。

[1]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第43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2] 陈圣宇：《“毗陵四家”与〈文统〉编纂》，《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张则桐也认为《学文堂集》序文作者“以陈玉璠为中心组成了一个商榷古文创作的群体”，参见《“毗陵四家”与清初古文演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3] 此本正文部分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刻成，卷首序文则为其后补刻刊印，现藏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武进盛氏刻本《常州先哲遗书》第一集所收《学文堂集》，即据此本重刻。上海《丛书集成续编》第126册据《常州先哲遗书》本影印，上海书店1994年版。本文所引此本《学文堂集》卷首序文，均据《常州先哲遗书》本，不一一出注。

[4] 此本凡四十七卷，卷首有缺页，现存吴伟业（序文首缺）、王崇简、周亮工、李长祥、魏际瑞、姜宸英、何黎、周启嵩、魏禧、戚藩、程世英、张侗等12篇序文。其中吴、王、周三序不同于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所录，皆为手写上版，题署后钤有印章。

[5] 《钱澄之全集·田间文集》，彭君华校点，第246—247页，黄山书社2014年版。以下凡引此文，不再出注。

[6] 陈禧：《燕山草堂集》，《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17册，第447页，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凡引此文，不再出注。

[7] 李邕嗣：《杲堂诗文集》，张道勤校点，第428—42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以下凡引此文，不再出注。

[8] 屈大均：《翁山文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4册，第82—83页，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凡引此文，不再出注。

[9] 储方庆：《储通庵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29册，第423—4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凡引此

文,不再出注。

[10] 毛际可:《会侯先生文钞一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29册,第781—782页,齐鲁书社1997年版。以下凡引此文,不再出注。

[11] 邵长蘅:《邵子湘全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45册,第2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凡引此文,不再出注。

[12] 张贞:《杞田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47册,第383—3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凡引此文,不再出注。

[13]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罗根泽校点,第1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14] 刘勰将叙(序)列为“论”体“八名”之一,云:“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3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5] 魏禧:《魏叔子文集·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八,胡守仁等校点,第361页,中华书局2003年版。

[16] 余英时指出:“求序者是‘同气相求’,写序者则是‘同声相应’”,序“体现了中国知识人追求彼此之间在心灵上的自由交流。这一追求是中国文学、思想、学术得以不断推陈出新的精神根据”。参见《原“序”——中国书写史上的一个特色》,《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17] 陈玉璠:《学文堂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43册,第1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18][26][28] 陈玉璠:《学文堂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42册,第487页,第515—516页,第6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19] 李长祥:《学文堂文集序》,《学文堂文集》卷首,页一a,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间刻本。

[20] 这27人是:冯溥、吴伟业、王崇简、周亮工、黄与坚、奚禄治、盛符升、陆燾、魏际瑞、周启嵩、程世英、钱肃润、汪懋麟、魏禧、越闾、何昞、李颙、陈瑚、杜濬、

张侗、谢良琦、黄永、陈维崧、沈泌、徐喈凤、李邕嗣、邵长蘅。陈玉璠的文章均见于《学文堂文集》。

[21] 《学文堂文集》各体预置的序列是“以类相从”的,如序经、序史、序子、序文、序诗等。清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中“序六”“序七”“序十二”“序十五”“序十七”“序十八”“序二十”,小字标注为“阙”,当即预先为其后撰写的文章留下余地。

[22] 如初刻本《学文堂文集目录》中“序二”下注:“五首(阙一首)”,而南京图书馆藏不分卷本《学文堂文集》中“序二”下收录14篇文章。

[23] 官方学术共同体,如江宁织造曹寅奉清圣祖玄烨旨意,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在扬州设局,主持编纂刊刻《全唐诗》,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潘从律、汪士鋐、徐树本、车鼎晋、汪绎、查嗣琛、俞梅等“词臣”参与其事。

[24] 参见严迪昌《“市隐”心态与吴中明清文化世族》,《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25] 《文起》编选者是董文友和龚百药,参见李长祥《与董文友龚介眉书》,《天问阁集》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册,第252—253页,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27] 储方庆:《与邹程村论谢献庵题名记书》,《储遁庵文集》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29册,第4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29] 李长祥:《与龚介眉陈椒峰论古文选本书》,《天问阁文集》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册,第258页,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30] 以上论述参见陈圣宇《“毗陵四家”与〈文统〉编纂》,《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31] 范方:《上陈椒峰书》后《附陈答书》,《默镜居文集》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33册,第672页,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马勤勤